

劳 生 志 略

— 引子

有许多东西在过去来说，因为没有这些录音设备，过去也就过去了。比如李龟年的歌唱，公孙大娘的舞蹈，曾经令杜甫那样惊叹；珠帘秀这样的伶人，关汉卿这样的大艺术家，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描写记录，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们的原貌了。科学的发展使许多事情成为了可能，至少谭鑫培这一代艺人的京戏我们已经听到了，也看到了，这应该说是老天爷的厚道吧。但是对于学人来说，有的人记忆力很强，所以能叙述得很有条理，我觉得胡适就有这个本事；冯友兰《三松堂自序》的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 比如说闻一多跟他开玩笑 贤者咸也，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。模仿《易经》上的话，他都记得。我恐怕缺乏这样非常有连续性回忆的能力。口述的历史只是因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它才成为可能，当它被人们掌握后无疑会变成史学的一个分支，而且还会壮大起来，所以口述史学是重要的。我最早看过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，他原来是一个海军世家，他的爸爸和伯父都是海军的或海军史的专家，所以他的回忆录写得非常丰满，八大本，好像是商务印书馆翻译过来的。而像饶宗颐的就写得比较简单或比较概括，他偏重他的汉学，同海外汉学的接触这一方面写得比较多。至于我个人来说，总的来讲是很简单。所以学生访问时，我说我是很简单的人，我的生平也很简单，除了晚年闯了一场祸，过了十八年不由自主的生活以外，其余都太简单了。如果要把我的一生划成几个段落的话，也只能根据我生活的自然段落：先是很小的时候读书那一段，能

够记忆的已经很少了。后来就到了南京，到大学毕业又是一段，跟着一些有学问的老师念书。这个我现在能回想起来，但具体的事实都不是很多。再后来就是抗战到胜利，我走上大学教书的岗位。然后就是解放以后这一段，就是运动。最后是到南京这一段。

我这一生逢到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没有沉沦下去。这个原因，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一些，就是对传统文化，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。我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，也是要用传统文化来加以衡量，也就是“批判地接受”。我对文化大革命是极端地反感，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事情，真让人连哭都没法哭。你看赵少咸先生搞那个《广韵疏证》六七十岁的人了，红卫兵把他抄了多少遍的稿子摆在他床面前烧了。我接到殷孟伦先生这样的信，简直连哭都没法子哭。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来，如果说这个文化中没有一种真正合理的内核，她为什么亡国多少次又站起来？从小的方面说，我是感觉到我个人总可以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，你们让我这样下去，我不服。所以这是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理解，也是对个人的自信。沈祖棻出了车祸以后，程丽则陪我在家住了三个月。她是工人，工厂里对他们很好，比武汉大学好多了，没有催她。后来他们厂长自己来看她一次，我就心里有数了，让张威克先去，再过了一阵，程丽则也去上班了。他们上了班，第二天我就开始整理沈祖棻的诗稿，我就觉得她的东西是有价值的。我一辈子对不起沈祖棻，因为她是一个应该过得好一点、舒服一点的人，可是我让她过得很苦，稍微好一点又出了车祸。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为对她的忏悔。大概你也晓得，我希望早早的硕士论文写她外婆的传记或写她的作品分析，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表示忏悔。我后来同陶芸结婚，她最了解我对沈祖棻的感情。她一点都不忌妒，是个好女人，很不容易。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，至少还是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赶回来，主要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小一点的理由，那就是对传统的珍惜，很强烈的感情；再就是我的个性，说到底我就是不服。长期以来，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

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压在心里，所以别人让我写回忆录，我尽量地不写。这次是一个机会，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。哪怕很软弱，但是又很坚强。这个传统从古代，《春秋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中记载的故事 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、黄宗羲，一直到辛亥革命，没有断过。

二 家世及早年求学经历

我原名逢会，改名会昌，字伯昊，四十以后，别号闲堂。千帆是我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，后来就通用此名。祖籍是湖南宁乡，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（现改属望城县）但上代已迁居长沙。1913年9月21日（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）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。

我的家境比较贫寒，没有多少物质财富，但却有一个非常丰厚的文学传统：我的曾祖父霖寿，字雨苍，有《湖天晓角词》；伯祖父颂藩，字伯翰，有《伯翰先生遗集》；叔祖父颂万，字子大，有《十发居士全集》。父亲名康，字穆庵，有《顾庐诗钞》。先父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，专攻宋诗，尤精后山。母亲姓车，名诗，字慕蕴，江西南昌人；外祖父名赓，字伯夔，侨居湖南，以书法知名当时。诗是我的家学，我幼承庭训，十二三岁即通声律，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，呈请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。叔祖的批语有“诗笔清丽，自由天授”之语，外祖的批语是“有芊绵之思，可与学诗”。这些过情的鼓励对我后来致力诗学，当然有很大影响。

我三岁时，母亲就去世了，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外家度过的。1923年左右，因为军阀混战，在长沙不易谋生，我家迁居湖北武昌，我也回到自己的家里。在武昌的五年中，我曾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属小学和汉口振华中学，但大部分时间是随堂伯父君硕先生学习的，他是我在古代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。在1928年秋天以前，我的知识主要来自私塾。伯父名士经，是子大叔祖的长子，自幼才华出众，以

早慧知名，十多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《曼殊沙馆初集》。但这也是他惟一的文学结集。他的才华如同在那个社会的多数文士一样，被困厄的生活压折了。

他那时流寓汉口，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“有恒斋”的私塾，招收了十名左右十二三岁到二十岁的少年，教读自给。20年代 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市，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，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的人家也不多，所以私塾也还不少。这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里，先在汉口模范区葛吉里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。

有恒斋的主要特点是起点非常高。我们从来不读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龙文鞭影》、《幼学琼林》 我们连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也不读，因为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。我们不读《纲鉴易知录》 而是一上来就读《通鉴》。按照君硕先生的设想 他几乎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知识都教给我们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学过的主要经典著作有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、《资治通鉴》 其中除《礼记》、《文选》外，都是通读的。所以我的文言基础比较扎实。

注意写作训练是有恒斋的另一个特点（当然全是用文言文）每天一定要写日记，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，读书心得。这既练习了文笔，又锻炼了恒心。当然是十分有益的。记得这些日记我在大学时还保存着，曾经将有关《礼记》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过。汪辟疆老师看到了，还曾夸奖说：今天学生肯治经的不多。我可没有敢对老师说，这是从读私塾时的日记中摘抄的。除了日记以外，每周还要作文一篇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。伯父改得可仔细，坏的墨杠，好的浓圈，赏罚分明，我们也就不敢随随便便。记得在一篇游记中有“隔江灯火，下垅牛羊”之句 又云：“烟波荡我心胸，晨昏异其观感。”他老人家高兴地说：也难为你了。我在最近把《闲堂诗文合钞》印了几百份，分寄给各地的朋友。我发现许多朋友非常欣赏我的文言文，为什么道理呢？他们基本上都做不来了，即使年龄和我差不多，但当年北方的学

校就不做文言文。倒过来看，觉得你能做几句就还不错。

君硕先生的讲授是文辞义理并重，所以选授《礼记》时，《曲礼》、《少仪》、《内则》以及有关丧服诸篇说得很详细。对于《礼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篇尤为重视。这对我一辈子做人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君硕先生虽然很贫困，但仍有些藏书。他常常指点我们在正课之外读些书，我也因此泛览了许多书籍。我从《日知录》初识考据门径，从《近思录》、《呻吟语》、《松阳讲义》初识理学面目。从《小仓山房尺牋》略知应酬文字写法。

写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，这包含两个内容：一个是正确，即不准写错字、别字（包括碑帖上的异体），这和今天要求的汉字规范化颇为相同。另一个是优美，即要把字写得好看。这就要读帖和临帖。我常用的帖：小字是《洛神赋》、《灵飞经》；大字隶书是《张迁碑》、《曹全碑》；楷书是颜真卿《颜氏家庙碑》、《颜勤礼碑》、褚遂良《倪宽赞》、《圣教序》、欧阳询《醴泉铭》等。但没有学过篆书和草书。总之，要求能知能行，写、作俱佳，也包括在君硕先生的教学目的之内。我后来在成都，那时已经是副教授了，为了锻炼自己的恒心，还用打好格子的纸抄写文章，最好的成绩是抄了七千字，没有一个错字。

说实在的，当日读这些书，许多地方没有懂，其中部分至今茫然。但懂了的，逐渐成为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在国学上打了一些底子了，这使我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文言文的能力。对于后来我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，这是很有好处的。我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前，学习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度过的。

三 接受现代教育

1928 年的秋天，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，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，从汉口来到南京，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，作为一名插班生，开始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，直到 1936 年大学毕业。

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，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。我至今怀念在中学时代给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：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，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。泰州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，谈笑从容，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。余姚黄云眉先生，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，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，一个学期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《圣哲画像记》，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，上着国学概论的课。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，所以“受之者其思深”。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，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去，勉励有加。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，是我难以忘怀的。

在高中时，我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，宁波王实铭先生。在他的循循善诱下，我对化学兴趣大增，成绩也极好。1932 年 8 月我升入金陵大学时，原先准备读化学系，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，竟然要付一百多块钱。我父亲当时失业，无力负担，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费情况，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，我就进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完全不同的道路，这也似乎有些偶然。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决定的呢，还是有其必然性，对此，我感到迷惘。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性

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，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。这样，我就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，却做了黄侃、吴梅诸位老师的学生。我想，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，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做出成绩来，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。

进入大学以后，现代文、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，对我来讲获益匪浅。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，从维也纳会议讲起，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；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，从鸦片战争讲起。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，是一门通论课，教社会学两个星期，经济学两个星期，法律学两个星期，人类学两个星期，等等，都讲得很扼要，讲完就考试。授课教师名叫虎臣，是个回教徒，后来去了美国，一直没有回来。他博学多能，也非常会讲课。所有这些课程，使我由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，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“现代化”了。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，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。然后再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。30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，大师云集。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，亲承音旨的机会；有的虽未尝从学，却也曾进登龙门，有所请益。现在想起来，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我跟黄季刚（侃）先生学过经学通论、《诗经》、《说文》、《文心雕龙》从胡小石（光炜）先生学过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史、甲骨文、《楚辞》从刘衡奴（国钧）先生学过目录学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从刘确泉（继宣）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（俊）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（梅）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（国垣）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（承祚）先生学过古文字学。我是金大的学生，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也常跑去听，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。我曾向林公铎（损）先生请教过诸子学，向汪旭初（东）王晓湘（易）两先生请教过诗词。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，虽在金大兼过课，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，我也常常带着问题，前去请教。

中大的管理很松，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，钱也不交，就这样读四年。像余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。

他口齿很好，字也不错，还会画画。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，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。像这样的人，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。金陵大学就不一样，有秩序，办事有条理，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、纪律散漫。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，不只是国学的，而是对待整个的学问的态度，她那种教会学校的严格对我有大的好处。我 1978 年回到南京大学，那时教务处一些很老的，从金大一直留下来当职员，都非常能干。

关于老师们，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，谈经解字，往往突过先儒，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，而我们都认为，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，挨骂也值得。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，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，由浅入深，使人无不通晓。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也从不保密。如翔冬先生讲授《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》，瞿安先生讲授《长生殿》传奇斟律，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，由于我们的请求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。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主臬，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。

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，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，后来研究散曲。他是一个大师，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。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、任二北，曲律研究传给了蔡莹、王玉章，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，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。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展，也有的往后发展。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，除南戏以外，笑话、谜语都研究。

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。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，他的学生也都是大师了，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，很难学，就不选，只选了有兴趣的课，像《文心雕龙》之类。

我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，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陈登原先生，研究文化史，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，他写的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国史旧闻》都是非常博洽。我喜欢博览群书 无论懂不懂 无

论是否自己所需要的，都想看看。这就是从陈先生那儿学来的。当时他还是一位讲师，别人并不重视他，但是我在陈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。

我在进金大之前，几乎没有接触什么白话文。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，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，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，但杂志看得较多，差不多每一期的《清华学报》、《燕京学报》都看。另外，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，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，到现在为止，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。不懂归不懂，当时吃下去再说，拿卡片记下来。还有呢，就是练习写。最初的白话文写作是学做新诗，现在还留了一本小诗集在那儿。当时练习写作，跟穷困也有关系。在报纸的副刊上写小文章，五毛钱一千字，一块钱就不错了。如果有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，四千字发表了，十二块钱，差不多一个半月的伙食费都解决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六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饭，如果是八块钱呢，一菜一汤还带一点点肉。我是个很穷的学生，全靠自己奋斗出来。我那个时候能写各式各样的文章，只要报刊需要我就写，一个月有个五六块钱，最好有个十块钱，就能够过下去了。我的爸爸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。那个旧社会，你们不能想像。比如换了一个厅长或局长，底下的人都换掉，不问你有理无理，有资格无资格。所以我就向各种地方投稿。我也写小说，写小说的最好成绩是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的。就这样，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大学念完了。刚好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史学研究所被批准成立了，我考取了，那等于是硕士研究生。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四百块钱的奖学金，生活是够了。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，也就没有办法读书，所以我是被金陵大学史学研究所录取的学生，但是没有上。那个时候已经同沈祖棻恋爱了，想结婚了。她是研究所毕业，我是大学毕业。我在金陵中学教书，就想一边教书，一边在金陵大学的历史研究所读课程。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到燕京大学去，到哈佛燕京学社，也有一定的奖学金，那就像王钟翰这些人一样，同他们一辈。他们审查了我的作业，说你的英

语不行，过来补一年英语，第二年录取你。当然没想到要打仗了。燕京大学的那些教授有顾颉刚、洪业，还有陆侃如他们，当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，好像给黄季刚、吴梅先生当过学生的，再去给顾颉刚他们当学生，就吃了亏一样。这种心理很奇怪，我也很少同人家讲起。中国旧学很注重传统、班辈。当大师的晚年学生，在辈分上就很占便宜。的确是，比如任老是我的前辈，但他同我说起来是师兄弟，他写信给我也是这样称呼的。

除了以前为了生活而投稿，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，我一辈子写得最早的学术论文，是在刘国钧先生的班上写的作业。那时他给研究生讲《汉书·艺文志》研究，因为是研究生课程，不是闭卷考试，而是做一篇文章，我那个时候对目录学、校勘学有兴趣，我就写了两篇，不是一篇，后来收在《闲堂文藪》里面。一篇是《汉志·诗赋略 首三种分类遗意说》。因为陆贾赋、荀卿赋、屈原赋没有序，别的都还有几句话，恰恰这个没有。刘先生让大家各抒己见，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。另外又写了一篇《别录、七略、汉志源流异同考》，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据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乱中散佚掉的。后来就只有辑佚，大概总有十几、二十种。清朝人作辑佚，慢慢地弄清楚了，我就根据清儒的考订结论作进一步推论。现在弄清楚《汉书·艺文志》是把刘歆的《七略》七卷压缩为一卷。《别录》在留下来的宋版书中有所反映，像《荀子》等。所以我写书时，对于底下的篇目我不用目录两个字的，因为目是目，录是录，我总是写作目次，写篇目也可以，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。总之，先有一个命题的规范，要解决什么问题，然后就是论证，再就是推出结论。所有引用的材料，要有比较谨严的出处。这就是我开始写学术论文，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也就是 1935 年的冬天。此后我就按照这个轨范陆续写了一些文章。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 1936 年的春天，写的是《少陵先生文心论》，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，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。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

和，他拿了也没改，打了个分数，这以后就毕业了。毕业以后在金陵中学教一班初中二年级的语文，编校刊，一个星期出一期，就是《金中周刊》。这个周刊没有保存完整的。我很想得到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发表在上面，也还有沈祖棻的许多散文，我想找来收到她的集子里，找不着，没有办法。

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，我前后娶了两个妻子，都是金陵大学的同学。沈祖棻比我班次高，她年纪也比我大。当时在女同学当中，老师也好，同学也好，对她的文采评价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她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。她读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是三年级学生。当时三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好的，可以听研究班的课。这样，我就有机会同她接触。后来打仗了，我们从南京逃到屯溪，就在那里结了婚，跟我受了一辈子的苦，在学校的时候，陶芸和我同级但不同系，互相认识。后来沈祖棻不幸过去之后，我想再找一个妻子，我就了解一下，她也很不幸，丈夫因政治问题去了台湾，同她离了婚。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，现在一个在美国，两个在南京。我就开始同她通信，到了南京了解这些情况后，就比较快地结婚了，因为大家过去都是有所了解的。我们两个人，学校说是模范文明家庭，我们的确处得很好。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她有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我们很和谐。我现在很衰老了，很多事情都要她做。比如说今天早上，我要回答广州一个新闻记者的信，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，那个人认错了一个字，我就要告诉他你认错了，应该是什么字。但我自己不能写，就要她帮我写。前时香港中文大学拿一篇稿子来叫我审查，我审查以后又要批一段，也是她给我抄了以后送走的。生活上依靠她的就更多，她如果不按时给我吃药，我就完全不会想起。我说这些的意思是，金陵大学给我的，不仅是学业和事业，也还有婚姻问题在里面。

四 四川和武汉

抗战开始了，我找不到工作，有人推荐我到四川重庆的西康建设厅，职务是科员。我的工作是为厅长私人写信，实际上就是秘书工作。我因为才毕业，所以当不上秘书，只是一个科员。当时的厅长是叶秀峰，他是陈立夫的大学同学，又是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同学。匹茨堡大学的冶金专业是很有名的，陈立夫在那里学习。后来回国以后，就不搞工科了，搞政治，同他的哥哥陈果夫一起，他们两个是国民党的元老陈英士的侄儿。后来叶秀峰就跟着陈立夫走，他到西康当建设厅长，也是陈立夫的关系。他不常常在康定，一有时间就到重庆，所以我那时也常到重庆。一年多以后，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问题，不知是陈立夫、陈果夫与刘文辉有什么矛盾，所以叶秀峰就不当厅长了。当时在乐山有一所中央技艺专科学校，有蚕桑、制革、农产制造等专业，现在或者叫技专，陈立夫就想让叶秀峰去当这个技专的校长，叶秀峰不肯做。他后来就说，你原来手下的一班人如果没有地方去，可以到这所学校去教书。这样，在 1940 年的 2 月，我就到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去教语文。那几年中我什么论文都没有写。我在那里教全校的语文，一共五个班，每班两个小时，共十个小时。这个学校虽小，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学生，名叫杨惠敏。上海沦陷时，谢晋元的一团部队退守四行仓库，坚决不投降。但是没有国旗，不能表示还没有沦陷的意思。这个杨惠敏，一个小女孩子，就在半夜里冒着危险从苏州河游过去，把国旗带在身边，送给他们，又安全地游了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

就有国旗竖起来了，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。我在技专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也考到这所学校，后来宋美龄还接见过她。这么一所不起眼的学校，有这么个学生却很有名。

我在技专工作了有一年半样子，当时武汉大学也到了乐山。刘永济先生原先是湖南民德中学的老师，后来才到武大的。他在长沙的时候，与先叔祖程颂万有来往，拿家庭世交关系来说，他是个晚辈。我家里一直藏着一幅十发老人的画，上面有刘老师的题字，后来不见了。我估计是“文革”中被抄走了。刘永济先生到了乐山以后，我去看他。我当然也是很希望有机会到武大去教书，就带了几篇文章去，又把沈祖棻的词抄了一些给他看。刘老师晓得我的家世，原来是个世交子弟，再看到我同沈祖棻很用功，也很高兴。因为他在四川很寂寞。那个时候刘老师住的地方叫做学地头，是过去学宫的一块荒地。那个地主姓蓝，过去给军阀当过副官，攒了一些钱，砌了两所房子，就在那个地方，等于说是隐居吧。他把多余的房子租给我们。刘先生住在山腰，我住山顶上。我在山顶的邻居是钱歌川，他的诗集里还有同我往来的诗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大概是 1941 年，我知道武汉大学要招人，添一个教大一国文的，我就去见刘先生，刘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到武汉大学教课，我说当然愿意。他又说武汉大学有个怪规矩，夫妻两个人不能在一所学校教课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杨端六和袁昌英。杨先生这个人，蒋介石曾请他当过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厅长，军衔是上将，他替国民党的军队建立一个非常强的会计制度。他又是英国的经济学博士。袁先生留学法国，写过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在五四前后的早期女作家中是很有名的。他们在武汉大学刚开始办时就来了。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夫妻留学生要进武大，就立了这么一项规矩。当时沈祖棻不是一个社会性的女性，她并不是非要教书或工作不可，两个人只要能够生活，她就不教书。这样我就到了武汉大学。原来是要我教三个班大一国文，刘先生就同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商量，把中文系本科一年级的国文提出来，单独成立一个班，讲得深一点，每周五个小时。

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三个班，九个小时的课，我是教十一个小时。中文系是五小时，教的内容就是《文论十笺》，这是后来的名称，当时叫《文学发凡》。我最初对是不是要选《文心雕龙》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。考虑的结果还是不选，因为很容易破坏它的整体性。这个讲义原来有三部分，现在印出的是总论，还有一部分是骈文，一部分是散文。我后来在武汉大学讲下来，十篇讲一年紧得不得了。那个讲义的底子也丢掉了，现在记不住是哪些篇，只记得关于骈文的有李兆洛《骈体文钞序》，散文方面有《经史百家杂钞序》、《古文辞类纂序》，一共有二十来篇，有一个油印本发给学生，不讲，让他们自己看。

武大当时有个《文哲季刊》，那时的印刷、纸张已经很坏了，因为我还在搞目录学研究《文史通义》就写了一篇《言公通义》现在还存着，收在《闲堂文薮》里。

后来我又认识了徐哲东（震）先生，是太炎先生的弟子，常州人，讲公羊学，又讲韩柳文。他先在中央大学当讲师，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已经升教授了。徐先生住在乐山的城外一个叫做王石碑的地方，离乐山嘉乐门外还有十五里路。有一次，日本人听说蒋介石要去乐山视察，便派飞机把整个城市都炸了，这情报是错误的，但城市给炸了。当时人能够在城外找到房子的，都在城外找了房子。我住在学地头，离嘉乐门外大概有几里地，到王石碑还有十五里，很远。徐先生是练过武功的人，走这点路不大在乎。他在中央大学当讲师的时候，有一次中文系开会，请哲东先生舞剑，他答应了，舞剑的时候长袍子全身都作响。朱东润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，刘博平先生当系主任，朱先生教文学批评史，博平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，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不必修。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，人还没有来，要开学了，博平先生是系主任，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，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，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。徐先生到了以后，看到这个课表说，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，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。他同刘先生商量